

# 李济深与中国共产党

李 威 朱志龙

李济深(1885-1959),字任潮,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李济深青年时期便追随孙中山先生积极从事民主革命活动。李济深第一次与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接触,是在广州授领大元帅孙中山先生之命创办黄埔军校的初期,李济深与共产党人林伯渠(林同时也是国民党中执委和农工部部长)都是筹备组成员;军校创办后,李济深任黄埔军校副校长兼训练部主任,共产党员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李济深对这位年轻的、刚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同事颇有好感并深情合作;与毛泽东的第一次邂逅则是在1926年,李济深任南路总指挥统一广东的战斗胜利班师回朝之日,在广州国民政府召开的盛大欢迎会上,时任国民党中执委及代理宣传部部长的毛泽东也参加了欢迎会,并与李济深热烈握手,欢迎胜利归来,苏联共产党代表团更是向李济深赠送了许多纪念品。真正与中国共产党的密切合作,则始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李济深反对南京国民政府采取的不抵抗政策,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从事抗日反蒋活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更是积极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抗战后期与中国共产党谋划组建华南抗日联军;抗战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他坚决反对内战,致力于国内和平民主运动,参加人民民主革命阵线;新中国成立前夕,联合中国国民党左派创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参与新政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投身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直至1959年10月9日病逝前11天,还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各民主党派人士,发表了其最后一篇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致以最崇高敬礼和最热烈祝贺的感人讲话。以下是李济深一生之中与中国共产党人荣辱与共、合作奋斗的五个历史片段。

## 一

1931年,在侵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先前被蒋介石软禁在南京的李济深重获自由。面对共产党人抗日救国的号召,他马上请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积极投身中国军民抗日救亡斗争的行列中。1932年初,驻扎在上海等地的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抗击。李济深通电声援“一二·九”淞沪抗战,要求国民党当局速将东北义勇军等调入关内抗战,赴北平做张学良等人的工作,敦劝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1932年5月,蒋令十九路军赴福建参加“剿共”战争,李济深对此十分不满,于是年7月间愤而辞职赴香

港,随后公开举起了反蒋大旗。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的长城沿线发动进攻,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加重。李济深多次呼吁南京国民政府和两广实力派共同抗日,皆告无效。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李济深下定决心,联合国民党内反蒋实力派及民主派人士,依托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出任“中华共和国”主席。事变前夕,李济深授意十九路军派员到闽西苏区,与红军第三军团司令彭德怀会晤,双方同意停止战争状态,共同抗日。随后,十九路军又派军部秘书长徐名鸿担任福建省政府和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前往江西瑞金会见毛泽东、周恩来。双方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进行了初步合作。据李济深回忆,“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时,我们派员时中当代表去与中共联络,后来中共亦派张云逸、吴明、潘汉年为代表到福建来,但那时军事快要失败了。”

## 二

1934年初,福建事变失败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策动了所谓“自治”运动。为挽救民族危亡,李济深感到必须加快建立新的政治团体,此举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中共党员潘汉年、宣侠父等人先后来到香港,与李济深、陈铭枢等建立了联系。1935年7月,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大同盟)在香港正式成立,李济深出任主席兼组织部长,提出“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的政治主张及“集中一切力量进行民族战争”等八条行动纲领。同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指导下,北平学生爆发了“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高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呼吁“反对华北自治”。大同盟随即发表《告同胞书》,声援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呼吁立即集中全民族的力量,组织抗日救国军和国防政府,一致抗日。1936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反蒋抗日”的政策改为“逼蒋抗日”后,李济深接受并拥护中共这一政策,积极参与了日后逼蒋抗日的斗争。同年12月西安事变,李济深发出与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事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坚决反对国民党派飞机轰炸西安;同时,致电张学良等,请他保护蒋介石的安全,写信给宋庆龄、何香凝,切望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以利于实现全国抗战。这一年,李济深派陈铭枢偕中共党员胡兰畦等人访问莫斯科,与中共驻苏代表团商讨大同盟和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事宜。1937年3月,周恩来、叶剑英等赴上海抗日救国会成员杨德华到梧州,向李济深转达了中共关于建

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十点主张。李济深亲笔回信毛泽东、周恩来,拥护这些抗日政纲,表示将尽力推动抗日救亡运动。

## 三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蒋介石重新任用昔日的国民党内反对派。1939年3月,为“加强对战地工作的领导,协调国共两党两军的关系”,国民政府决定设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由蒋介石兼任,李济深任副主任,主持工作。为团结各方爱国力量,李济深将许多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安排进入战地党政委员会及其各地分会任委员。1940年,李济深调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在任期间,他赞助和支持抗日民主运动,掩护一批爱国民主人士,使得桂林成为抗战时期的抗日民主运动基地。1944年11月桂林沦陷后,李济深不愿意按照蒋的意图到重庆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回到家乡广西苍梧大坡山,大力组织民众抗日并得到了中共的大力支持和具体帮助。这一年9月7日,周恩来电示中共广东省临委:“一旦粤汉路被打通,应坚持广东半独立的面,以影响李任潮的民主运动,能如此,我们必予以赞助,并切实合作。”为贯彻这一指示的精神,中共广东党组织、东江纵队与李济深频频联络。中共同时打算在西南敌后及半沦陷区,建立以李济深为首的抗日民主政权。至抗战胜利前夕,中共中央更决定在南方成立以李济深为司令,以“东纵”和“珠纵”为主力的“华南民主联军”,准备在条件成熟时,团结其他力量,反攻广州。围绕以上建立西南抗日政权和“华南民主联军”的计划,中共和各各地抗日人士策划,发动了多宗重大行动,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给予李济深大力的支持;1944年成立了“三罗抗日民众武力指挥部”和抗日民主政权,广东南路、西江地区进行了一系列抗日武装起义,粤中抗日游击队西进,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东江纵队北上等等。由于日本宣布投降,抗战胜利结束,上述建立“华南民主联军”计划最终未能实现。其实,当时李济深处境艰难,不但政治上备受蒋介石的压力和迫害,经济上也很困难。中共华南党组织在李济深最困难之时,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先后派狄超白、李嘉人、连贯、杨基等与他携手战斗。

## 四

抗战胜利后不久,蒋介石撕毁和平协议,悍然挑起内战,李济深更加看清蒋介石的本质,也更坚定了联合国民党内民主力量、开展民主运动、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决心。李济深在中共的帮助下,积极开展反蒋军事策动工作,策动他的旧友、部下认清形势,转变立场,以各种方法起来反对内战、等待时机举行起义,并特派王葆真等人去进行具体联系工作。在李济深等人的不懈努力下,军事策反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一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先后举行起义,加入人民阵营。1948年元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式在香港成立,李济深任主席。同年4月30日,中共发出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口号”。5月5日,李济深等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联名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中共毛主席电》,认为“五一口号”“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允符同人等之本旨,曷胜钦企,除通国内外各界暨海外同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特此奉达,即希赐教。”此外,民革单独发表声明,“号召本党同志,全国人民为新政协之实现,人民代表大会之召开,民主联合政府之成立而共同努力!”年底,李济深决定接受中共中央的邀请,北上前往解放区。为使李济深

安全、顺利到达,周恩来亲自指挥了这次行动。在中共地下党的妥善安排下,李济深躲过了国民党特务和港英当局的监视,登上了北上解放区的一艘苏联货轮。1949年1月7日,李济深到达大连。1月12日,李济深在沈阳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明确表示:“贵党领导中国革命,路线正确,措施恰当,符合全国人民大众之需要,乃获今日伟大之成就,无任钦佩。济深秉承孙中山先生遗志,勉尽绵薄,为争取中国革命之彻底胜利而努力。”当晚,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先生来电诵悉,极感盛意。北平解放在即,晤教非远,诸容面叙。祝健康!”2月3日,李济深再次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表示愿以自己的言论及行动密切配合中共的政策和主张。北平和平解放后,李济深等人于2月25日到达北平,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李济深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0月,李济深赋诗抒怀:“叱咤风云定九州,指挥筹策世无俦。百年帝国宜回首,千载工农庆领头。耕者有田增出产,劳资合作利营谋。安心倒向和平阵,建设荣华万万秋。”

## 四

1949年9月,李济深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民革第一至四届中央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至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为促进国家的繁荣与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作者李威系李济深外孙、民革广东省委会原副主任;作者朱志龙系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馆长)



李济深

安全、顺利到达,周恩来亲自指挥了这次行动。在中共地下党的妥善安排下,李济深躲过了国民党特务和港英当局的监视,登上了北上解放区的一艘苏联货轮。1949年1月7日,李济深到达大连。1月12日,李济深在沈阳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明确表示:“贵党领导中国革命,路线正确,措施恰当,符合全国人民大众之需要,乃获今日伟大之成就,无任钦佩。济深秉承孙中山先生遗志,勉尽绵薄,为争取中国革命之彻底胜利而努力。”当晚,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先生来电诵悉,极感盛意。北平解放在即,晤教非远,诸容面叙。祝健康!”2月3日,李济深再次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表示愿以自己的言论及行动密切配合中共的政策和主张。北平和平解放后,李济深等人于2月25日到达北平,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李济深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0月,李济深赋诗抒怀:“叱咤风云定九州,指挥筹策世无俦。百年帝国宜回首,千载工农庆领头。耕者有田增出产,劳资合作利营谋。安心倒向和平阵,建设荣华万万秋。”

1949年9月,李济深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民革第一至四届中央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至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为促进国家的繁荣与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李威系李济深外孙、民革广东省委会原副主任;作者朱志龙系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馆长)



# 黄炎培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

程 炜



黄炎培

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江苏川沙县人(今上海市浦东新区),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先驱,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创始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建第一、二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等职。黄炎培从青少年时代起,目睹清政府腐败,国家积贫积弱,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他立志爱国报国,走上了革命道路。从一个科举出身的人成为民主主义革命战士和真诚的爱国主义者,成为杰出的教育家、知名的社会活动家、卓越的领导人。他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 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 开展救亡图存运动

1931年3月,黄炎培同江问渔一起,以中华职业教育研究会的身份赴日本考察教育制度,经过朝鲜时,他身历其境,深切感受到朝鲜人民当亡国奴的痛苦。在抵达日本时,他见到日本正大

办青年团,乡村军人很活跃,他预感到日本军国主义将要发动侵华战争。此时他回忆起前一次在日访问时,会见日本友好人士东京高校校长千岛精一的情景。千岛在黄面前大哭,说他担心日本青年军人的侵略野心如得逞,将使中日双方受害无穷。此时,黄炎培已无心在日本继续考察教育,在街上购得三本露骨宣扬日本军国主义野心的书籍,匆匆回国。在归国途中,得知日本将于当年对华作战,其计划是:“封锁中国海岸,攻打徐州,截断津浦铁路;再侵占郑州,截断平汉路,取我资源,做其军事后盾等等”,狂妄叫嚣“三个月内灭亡中国”。黄炎培回国后,撰写《黄海环游记》刊载于《申报》,以朝鲜人民当亡国奴的痛苦情景来告诫国人。1931年5月,黄炎培在南京见了蒋介石,将在日本所见所闻如实向蒋报告,并将购得的三本书交给他,蒋听后默不作声,要黄向外交部部长王正廷报告,王正廷听后不但没有引起警觉,反而出言讥笑黄炎培,黄听后十分愤怒。就在这次谈话四个月后,“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东北全境被日寇占领,华北也岌岌可危,事态发展被黄炎培言中。

黄炎培怀着了一颗强烈爱国之心出生入死,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一二·九”事变后,他联合各界爱国人士成立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后改为地方协会),并担任负责人。与抗日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取得联系,组织运输车辆冒着炮火将军需所需物资运送至前线。他还亲自到中华职业学校向全体师生作抗日动员报告。中华职教社多次举办“国难问题讲座”,邀请蔡元培、王云五、陶行知、章乃器等人士讲。为了保存我国民族工业不被日寇破坏,胡厥文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迁川工厂联合会,动员江浙沪一带140多家骨干企业将设备物资和人员迁到西南后方,黄炎培给予大力支持。

上海沦陷后,租界当局不准中华职业学校悬挂国旗,学校改为每日早晚以

铃声为记,当铃声响起时全体师生在原地立正,称之为“精神升旗”,象征在国难当头时仍不忘国家和民族。全体教师在自愿基础上,每月从工资中拿出2%捐献给抗日义勇军直至抗战胜利。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7人,因发动民众团结抗日成立救国会,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关押在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激起全国人民一致反对。黄炎培冒着政治风险去苏州看望“七君子”,向他们表示敬意和亲切慰问,责问蒋政府“抗日有何罪?”并与七君子合影留念,在照片上题诗一首。

## 应邀访问延安 目睹解放区新气象

1945年7月,黄炎培等六人以国民参政员身份应邀访问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同志热情接待。他在延安逗留5天时间里,除出席中共中央举行的欢迎会、座谈会和中央领导同志个别交谈外,其余时间自由活动。黄炎培和褚辅成,冷通利用宝贵时间,去工厂、逛商店、进学校,实地考察,与工人、农民、干部自由交谈,询问物价和生活情况。延安之行是黄炎培一生的夙愿,他一生奉行“理必求真,事必求是”的座右铭。延安究竟是怎样,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在延安他目睹了中国共产党的施政政策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和取得的成就。盛赞延安社会风气好,他见到的没有一寸土地荒芜,没有一个人在闲荡,军政军民关系和谐。在延安期间,毛泽东与黄炎培谈话多次。7月4日,毛泽东邀黄炎培、冷通到他家做客,促膝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你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希望能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

了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听后点头称是,认为“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用的”。这就是流传至今的“窑洞对”。

延安之行使黄炎培在解放区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这是国统区所没有的。特别是与毛泽东促膝长谈,受到了很大的启示,在解放区他看到了光明中国的曙光,增强建设新中国的信心。

回到重庆后,许多人来找黄炎培,询问访问延安的情况,有的还邀请他做报告,黄炎培说了一遍又一遍,实在应接不暇。他感到有必要把在延安所见所闻写一本书,取名《延安归来》,书稿完成后,他冲破国民党新闻封锁的禁令,通过国讯书店自行出版发行,初版两万册,一销而光,以后一版再版,成为国统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黄炎培将一个真实的解放区情况告诉大众,打破了国民党对解放区的恶意造谣中伤,如将书稿送国民党政府检查机关审查,必然被扣,这本小册子就出版不了。黄炎培无私无畏,不怕反动当局给他扣上“你为共产党作宣传”的帽子,他的“拒检”行动得到了文化教育出版界人士的赞扬。

## 创建民建 与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

访问延安归来,黄炎培立即专访胡厥文,俩人在商谈中取得了共识,即建立一个由工商界民主人士和有联系的文教界上层知识分子为主的,既能在和平建国中发挥作用又能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组织,十分必要。随即,由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人组成筹备组,经过三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完成了各项筹备工作。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宣告正式成立。

民建在成立宣言中提出,以“民主

与建设”为宗旨,以“推进民主、反对独裁,争取和平、反对内战,要求建设、反对破坏”为政治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和人民大众一起,积极投入反独裁、反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初,蒋介石指使特务在光天化日之下网罗人黄炎培在重庆的寓所。当时黄炎培在出席政协会议讨论和平建国纲要,暴徒进入他的寓所后,控制电话、封锁通道,捆绑工作人员,翻箱倒柜进行搜查。对于民建,蒋介石自成立之日起,就不予承认,把民建排斥在政协会议之外,民建会所数次被查抄,禁止民建机关刊物出版发行。1947年5月3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捏造声称,“民盟及其化身民建、民进、民联等党派,已为中共所控制,其行动均遵循中共旨意”。悍然宣布民建为“非法团体”,予以取缔。为保存实力,民建被迫转入地下斗争,把民建改名为“民立公司”,由民建临时会在中共地下党指导下开展秘密活动。随着解放战场形势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断取得胜利,蒋介石气急败坏,对爱国民主运动更加疯狂地镇压,把一批著名民主人士实行软禁、列入暗杀黑名单。黄炎培蛰居上海,其行动受特务严密监视,处境十分危险。1949年2月14日,经中共地下党的精心安排,借黄炎培祝寿为名,在宾客盈门之时化装离家,转移至女儿家住了一晚,次日登上一艘外轮离沪抵达香港,后又转赴解放区。黄炎培抵达北平后,在电台做“为人民解放而奋斗”的广播。蒋介石闻讯后恼羞成怒,下令特务不要放过黄炎培的儿子黄竞武。黄竞武在上海中央银行担任稽核专员,此时他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做秘密策反工作和阻止国民党中央银行将库存的黄金白银偷运至台湾。5月12日,黄竞武被国民党保密局逮捕,受尽酷刑,但他宁死不屈,惨遭活埋,时年46岁。黄炎培晚年痛失爱子,十分悲痛,但他又是坚强

的,新中国成立后黄竞武被认为革命烈士,在上海隆重举行的追悼会上,黄炎培在祭文中说:“竞武于前清光绪二十九年6月10日生于川沙,那时候,我在川沙办小学。因在南汇县演说,被捕下狱,两江总督电令就地正法,就在电令到达前一小时,得救后去日本。其时竞武出生还不到20天。料不到,我活了72年,到今天我的头还在颈上,而竞武被捕惨死了。竞武死了,你若预知死后8天,上海600万市民得到解放,竟武你虽死得惨,也可以安心了。”黄炎培受重大打击后精神没有被压垮,斗争没有退缩一步,他更加投入了蒋介石的反动本性,爱国民主的斗争更坚强了。

## 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 参与国家大事协商

1949年9月下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举行,黄炎培等12位国会议员代表民建界别参加这次会议。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向世界庄严宣告:“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团结的会议”“我们的工作写在人类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黄炎培听了心潮澎湃,他在会上生动形象的比喻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所“新的大厦”。这所大厦是“钢筋水泥的许多柱子撑起来的。”这些柱子是什么?第一是中国共产党,还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这些新的大厦的基础是什么?从理论基础来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所新的大厦,有5个大门,每个大门写着两个大字,这就是“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

1949年10月1日,黄炎培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开启了新纪元。

(作者系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

